

S0487



鄭成功研究

披雪

第三輯

.48
.3

泉州鄭成功學術研究會 編



1999年骆朝宗先生往台探亲，10月13日在台北市与郑明能先生会面



南（安）同（安）交界之小盈岭关隘郑军在此击退清军

《郑成功研究》第三辑

目 录

一、世说新语

- 1/ 丰功伟业耀古今 王伟明

二、学术论苑

- 4/ 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
..... 泉州市郑成功学术研究会课题组
- 12/ 郑成功驱荷复台与历史反思 (美)汤锦台
- 19/ 培植郑成功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从文学的角度研究郑成功
..... 朱双一
- 22/ 简谈开展对郑成功研究史的研究 蔡振翔
- 24/ 芦洲国姓醺与郑成功 (台)杨莲福
- 32/ 麟洛宗教信仰中心——郑成功庙的建立 (台)杜英贤
- 35/ 郑成功复台与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 郑 辉
- 43/ 论郑成功开发台湾 白庭阶
- 50/ 郑成功的台湾屯垦看其农本思想 徐 斌

三、文化视点

- 55/ 泉州旅游业打响“郑成功”品牌之探讨
..... 泉州市郑成功学术研究会课题组
- 60/ 郑成功在日本 曾文彬

四、研究活动信息

- 62/ 泉州市郑成功学术研究会工作情况回顾 黄夏莹

- 64/ 泉州市郑成功学术研究会第四次理事(扩大)会简况 史 军
- 66/ 专家学者聚首泉州 筹划拓展郑学研究——“省内学者郑成功研究征稿座谈会”概述 维 明
- 67/ 台湾来鸿—郑明能先生给研究会的信
- 68/ 南安市举行《郑成功收复台湾 340 周年》纪念邮票首发活动 史 军

五、资料点击

- 69/ 台湾官方郑成功复台纪念与春秋二祭 李延贵
- 70/ 台湾郑成功庙宇佳联集锦 李延贵
- 74/ 荷兰人统治台湾的珍贵史料——荷兰档案 李延贵
- 75/ 中外学者研究“郑成功与台湾”主要论文与专著目录 李延贵
- 85/ 郑氏祖孙三代经营台湾大事记 李延贵

《郑成功研究》编委会

主 任:黄夏莹

主 编:侯小莹 王伟明

副 主 任:侯小莹 王伟明

副 主 编:许文听

编委委员:黄夏莹 侯小莹 王伟明

封面题字:梁披云

许文听 黄菲菲 蔡成祖

摄 影:许文听 陈朝晖

郑瑞鑫

丰功伟业耀古今

——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340 周年

王伟明

1662 年 2 月 1 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郑成功率领军民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将困守热兰遮城的荷兰殖民势力驱逐出去。被荷兰殖民者占据达 38 年之久的中国宝岛台湾,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怀抱。郑成功驱荷复台,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壮举,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炎黄子孙的世代传诵。

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前人对他的丰功伟业的赞誉,可谓史不绝书,车载斗量。今天,当我们跨进新一个世纪的门槛,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340 周年之际,认真回味前人的各种评述,放眼当今国际格局,审视海峡两岸关系走向,更能够深切地感到,郑成功收复台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一,郑成功复台,牢固奠定了台湾归属中国的历史地位。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三国时代,吴王孙权就派遣将军卫温到过台湾,闽粤沿海很早就有先民漂流过海到岛上居住,南宋乾道 7 年,泉州知州汪大猷,曾遣军民屯戍澎湖。元代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地隶泉州晋江县。但是,由于长时期台湾岛内人烟稀疏,荆棘丛生,经济落后,远离大陆,封建朝廷并未建立统治机构。进入 17 世纪,世界正处于大航海时代,西方殖民势力——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相继东来,在南亚、东南亚等地建立殖民地,并多次袭扰台湾,而此时,奉行闭关锁国,腐败无能的明朝廷对此茫然无措。1624 年,荷兰殖民者窃踞了台湾,开始进行野蛮残酷的殖民统治,并以台湾为基地,企图染指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北亚地区。众所周知,自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海洋”对人类生活、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愈益突出。19 世纪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在总结西方列强兴衰的历史经验时一语道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台湾以其特定的地缘优势,成为中国进出大洋的战略枢纽。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台湾的命运必定是长期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中国不可避免要失去浩瀚的蓝色水域,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时刻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正是由于郑成功胜利地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截断了荷兰人从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到长崎(日本)的贸易链条,使荷兰人在远东的海上势力一蹶不振,也使西方殖民者失去了向东亚扩张的跳板,打乱和遏制了西方殖民体系在东亚的形成,才牢固地奠定了台湾归属中国的历史地位,捍卫了中国海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中华民族迄今都深享其益。张学良将军在谒延平郡王祠时题诗:“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朝,确保台

湾入版图”。道出了全体中国人对这位伟大英雄的由衷敬佩。

其二,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反对外敌侵袭的伟大旗帜。1661年4月,郑成功率大军从金、厦出发进兵台湾,他在致荷兰殖民者的信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台湾是中国的故土,久为贵国占领,今藩主既来,此地应归我。他所面临的强敌是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世界头号海上强国——荷兰,后面又遭到清朝厉行“海禁”,腹背受敌,致使郑军给养困乏、进退失据,但他收复台湾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经过长达9个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驱荷复台战略胜利。在郑成功身上,展现出中华民族不甘忍受外敌侵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韧不拔的浩然正气,谱写了中华民族反击外敌侵略的胜利篇章,他所建立的功业影响超越了国界,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东方民族反抗西方殖民主义树立了光辉榜样。从那时起,每逢遭受异族侵略,中国人民总是以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相砥砺。1895年清廷因甲午战败割让台湾后,台湾绅士丘逢甲领导的抗日保台斗争,即以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壮举相号召,修建和祭祀“延平郡王祠”,并为祠庙写了“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旧河山,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驱外夷出境,开辟千秋新世界,愿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的对联,表达了台湾人民在郑成功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为中华民族的尊严誓与台湾共存亡的豪情壮志。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郑成功与林则徐等民族英雄,成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旗帜,他们英勇无畏、精忠报国的崇高气节,激励无数的仁人志士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可以说,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宝贵财富。

其三,郑成功在台湾建置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即着手开发、建设台湾,把大陆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移植到台湾,置赤嵌为承天府,设天兴、万年二县,第一次在台湾本岛建立了中国行使主权的政权机构。郑成功对台湾少数民族实行和睦政策,帮助他们发展经济,鼓励并妥善安置大陆渡台移民、引导他们开发建设台湾,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使台湾形成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以中华文化为维系的社会,为后来康熙年间全国实现统一奠定了客观基础。

其四,郑成功深受世人尊崇,是海峡两岸人民团结的精神纽带。郑成功一生所建立的不朽功业,使他成为中国人民由衷敬仰的历史人物。早在台湾归清之初,康熙皇帝在郑成功归葬南安时就写了挽联赞曰:“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晚清光绪年间在台南建立延平郡王祠,官方就于每年农历二月下旬与八月下旬,分别举行春秋二祭。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为延平郡王祠题词赞曰:“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台湾人民把郑成功尊为“开台圣王”,纪念郑成功的祠庙达140多座。1948年由台湾省参议会建议制定每年四月三十日为春祭日期,1950年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将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定为秋祭日期。1959年,台南市文献委员会以郑成功登台日应为四月二十九日,因此转呈台湾省当局将春祭重订为该日,同时亦为复台纪念日。从此,官方于每年四月二十九日及八月二十七日,都于台南延平郡王祠举行春秋二祭。从明郑以来的台

湾文化史,充满了浓厚的遗民忠义精神,其精神源泉,都可以追溯到郑成功开台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处于对峙局面,但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仍然通过各种形式纪念郑成功。1962年,值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之际,海峡两岸都举行了拥有相当规模的纪念活动。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台湾解除戒严之后,两岸人民的往来越来越密切,不少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前来大陆寻访郑成功史迹,凭吊英雄业绩。大陆的有关单位、机构,召开了数次颇有规模和影响的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不少台湾友人应邀参加。对这位民族英雄发自内心的尊崇,使两岸人民在交流交往中增浓了同胞爱、手足情,增进了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反对台湾分裂独立的共识,诚如已故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所说,郑成功是海峡两岸人民团结的精神纽带。

其五,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经验,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智慧源泉。应当看到,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在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下,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兴风作浪,伺机图谋台湾独立,分裂祖国。严峻的现实迫使我国政府在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不得不进行军事斗争的准备。为了粉碎“台独”的图谋,我们有必要重温历史,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经验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智慧。正确地进行战略运筹,以武力为后盾,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手段,争取民心,孤立敌人,控制台海制海权,这一切宝贵的历史经验,都值得我们新的历史条件下合理地消化吸收、融汇贯通,使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时能更好地把握主动权。

其六,郑成功经略海洋的实践,对我们面向21世纪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迪。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曾经有过经略海洋的辉煌,迄至明朝前期,中国的海上力量仍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由于明清两朝统治者的短视造就闭关锁国的心态,在十七世纪第一波及全球化的浪潮中逆流而动,推行反动的海禁政策,严重摧残本国的海上力量,错失了经略海洋、拓海开疆的历史机遇,终于在19世纪中叶被迎面而来的西方殖民势力的典型代表——大英帝国一举击败,并饱尝了不断战败割地、山河破碎的苦果。惨痛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在审视21世纪的兴国方略时,特别需要唤醒国人的海洋意识。重新认识郑成功这位中华民族纵横沧海的大英雄,有助于国内海洋意识的觉醒。近年来,不少学者在深化对郑成功的研究中认为,郑成功最大的成就和国人迄今难以企及的能力,在于创建一支声势赫赫的海上力量。凭籍这支力量,他掌握了远东水域的制海权,挫败了早期西方殖民势力在远东建立霸权体系的图谋,其经略海洋的煌煌业绩,深远地影响到了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领土格局。21世纪是人类又一个进行海洋大开发的世纪,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我们必须从先辈的实践中汲取智慧,重视对海疆的保卫和海洋的开发,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

成功大名垂宇宙,丰功伟业耀古今。我们今天纪念郑成功,更要自觉地弘扬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继承他所留下的丰富历史遗产,为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泉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泉州郑成功学术研究会副秘书长,
该文刊发于《中国政协》杂志2002年第2期)

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 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

泉州郑成功学术研究会课题组

一、关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探讨

从195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了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有孔经纬的唐代说、束世澄的宋代说、钱宏的元代说,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尚戎、邓拓、范文澜等人的明清说,1977年以后胡寄窗、傅筑夫又提出战国秦汉说。¹

讨论的范围是农业社会中的手工业领域的纺织、矿冶、制陶、井盐、造纸、采煤、制糖、榨油、粮食加工、金属制造等行业,主要论据和论证一般围绕雇佣劳动、资本运转等工商经营方式展开。这些讨论对于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活动同工商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差别,作了详细区分和细致的梳理归纳,对于进一步讨论是有益的。

二、以往讨论的评述

讨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首先应该决定两个重要的概念,即“资本主义”和“萌芽”,因为这是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从现代观念看,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要比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更准确,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但并非就一定造就现代产业革命。也就是说雇佣劳动现象、用资本投入商品生产、商品销售的过程,从中赚取商业利润的现象,无论哪一种文明区域内,在其历史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但未必都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雏形。“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²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社会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时,或者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新型社会制度时,不仅仅看作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时,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社会制度,但必须承认其中的经济运作是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将它和社会制度划等号。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的其它领域,他们被经济基础所制约,同时又受制于这些领域,从而构成社会互动。在这种有机的观念引导下,我们进一步从植物学借鉴来的“萌芽”一词不如动物学的“胚胎”来得科学。³植物的萌芽状态不能反映成型期的茎、叶、颗粒,动物的胚胎已具有生命体成型期各种器官的雏形,

并且这些器官大部分已在发挥各自的功能,尽管是微弱的。建议以后能否用“资本主义胚胎”来替代“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学界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进而把将历史上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一对号入座,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发现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以西方历史为参照

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方式直接联系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直接反映生存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生产各个部门都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市场原则凌驾于社会各种权威之上,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以及各种国家机器都围绕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同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的意识形态互相支撑、互相扩张并构成互动。

参照马克思·韦伯的观念并考察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商业经济活动,我们发现单纯的商业经济活动如雇佣劳动、资本运作、工商资产的积累和扩张、赚取剩余价值、追逐商业利润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它即存在于奴隶社会,也存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即不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属性,更不能决定社会的属性。因此,资本主义雏形和萌芽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其他社会领域围绕市场原则这一社会最高权威的互动。只有这种萌芽状态的互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商业经济只有在上述特定环境中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否则只是其他类型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出现的商业经济,无论其程度怎样,仅仅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农业社会中的商业经济,因为这种商品经济从其一开始到成熟,都处于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并在相当程度上与周围环境构成互动,最终无法瓦解传统社会。这种受制于传统社会并服务于传统社会需要的商品经济,无论多么发达都应定性为农业社会的商品经济。

近年来,市民社会是学术界热门话题。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产生出依附这一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属性的差异,也就造成市民社会性质的不同。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因其商品经济的共性,肯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共同处。同样,因其农业社会性质的商品经济而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着很大区别,从宏观上而论,由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对传统社会构成威胁,所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从一开始就同传统社会形成敌对,并最终将后者毁灭。

四、过去史学界讨论之检讨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IV}其中的主流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即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

要结果。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仅仅是农业社会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是将农业社会性质的商业经济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经济进行简单的类比后,误将前者当作后者的萌芽的讨论。

某种商业经济的社会性质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对于它的有效控制,取決它同其他社会因素是否处于良性互动。把封建社会瓦解仅仅看作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逐步瓦解了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到底是何种关系,目前只有用“共生”和“互动”来解释。由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取决于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互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离开了资本主义其他社会因素将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讨论。

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注意从整体上综合地考察资本主义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新教伦理是造就产业革命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泰格(Michael E. 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 Levy)从资本主义的法律因素考察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麦尼尔从资本主义军事活动起源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关系,把资本主义归纳为“商业——军事复合体”。他们的论述都是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证明。

五、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分析

对照西方在近代所发生的情况,中国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的行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傅衣凌先生较早发现了这一问题,1980年代后,林仁川等一批学者开始有系统地研究东南海商现象。尤其是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郑成功集团。关于郑成功海上集团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用赘叙了。我们尝试用麦尼尔的“商业——军事复合体”理论来对郑氏集团进行分析。

在麦尼尔看来,今天世界上的人们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生存样式,把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强加于世界和历史,并以实践论证其合理性的是欧洲。然而,最早向世界和历史提供这种生存方式的却是东方的中国,时间是宋代。但麦尼尔认为:尽管中国宋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市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部分地影响了政府行为,但始终处于中央集权性质的指令性结构严密控制之下。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指令性结构从未受到过真正挑战。麦尼尔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其二者之上,是西方近代所以强盛的最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从明代逐渐落后,关键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能摆脱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控制^V。

麦尼尔认为:欧洲长期的政治分裂是市场原则得以凌驾一切主要因素。分裂形成对外界资源的需求,必不可少的长距离贸易活动不能没有武装护卫,否则将遭受乡村骑士和沿途强盗抢劫,而最初的贸易集市点(后来逐渐发展为商业城市)也需武装保护。这样大约从13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出现了“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最初萌芽,它成了中世纪乡

村社会的“异化物”。这样一个复合体从北意大利开始向低地国家、法国、西班牙扩散。在“军事——商业复合体”范围内,市场原则高于一切,由于军事武器是统治社会最重要的物质,武器的改良和发明在政治分裂、市场需求、竞争法则的环境中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并一直延续到近代。也就是说欧洲从13世纪到20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三次转换。市场原则成为欧洲军事工业迅猛发展的长期动力^[1]。

反观中国,由于不存在欧洲分裂的状况,大一统的局面所必然采取的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使原始的农业社会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强化,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强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指令性管理结构本身。这种社会只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胁,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军事技术的努力都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大约在15世纪,在北意大利已形成的军事——商业体制带来了属于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的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本质上是为其服务的。不仅如此,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道德、法律、金融、关税、银行信贷、技术专利、生产专业化等等都以军事——商业体制为核心蓬勃兴起,并构成这一体制的社会背景,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相互支撑、互相扩张,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循环。

麦尼尔告诉人们,原始的资本主义是从战争领域获得突破的。16世纪欧洲各君主国极欲控制武器的生产,但当时生产欧洲最先进的军火中心都属新兴的商业中心。例如列日城生产欧洲最好的大炮,每当被君主国军队占领,生产就立即瘫痪。这表明:只要武器价格由工匠和资本家自己来定,君主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的物品,即使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也不得不照价付钱,否则一无所获。这一历史事实揭示了被许多学者所忽视的现象,市场原则最初是在人类战争事务领域突破指令性结构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过渡时,每一次都以战争领域作为突破口。

顺便要指出一点,中国学者顾准通过自己的研究同样发现,军事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出现和确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2]

麦尼尔和顾准注重军事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路对分析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社会性质十分重要。郑氏集团在经济上主要从事海上贸易,以追求商业利润目的。为保护海上贸易而建立水师,并用商业利润来维持它的水师。^[3]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与以往内地的割据政权不同,其政治和外交功能也基本围绕海上贸易这一核心运作。郑成功集团在其管辖区内,经济、军事、外交、政治四者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相互扩张的社会反馈回路,这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郑氏集团其所代表

的社会性质近似于麦尼尔所说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因而真正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于农业税收的现象。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我们知道由于长期治水和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中原农耕区域采取了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其具体体现于经济上的计划性，政治上的高度中央极权，文化上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道德上的利他主义。西方现代化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市场原则，体现于经济上的自由贸易、机会均等，平等互利；政治则取建立在商业活动带来的契约精神之上的民主制；文化意识形态上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等一套价值体系，道德上倡导个人主义（并非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体系所认为的那种“个人主义”）。另外要指出的是，西方以市场原则为社会整合力量的现象从古希腊以来就有传统。

现代化同商业经济的关系可这样描述：有商业经济不一定发展到现代化，没有商业经济肯定没有现代化。商业经济在何种情形下能向现代化迈进？笔者认为像历史教科书上的“江南丝织业”是无法蜕变出现代化社会的。因为传统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有效地遏制了它突破传统经济的藩篱，使它处于小农经济的“补充成分”的永久性角色定位上。

我们不敢断言象郑成功之类的海商集团若能生存下去，就一定会带来现代化社会的质变，但同“江南丝织业”相比，迈向现代化的可能性要大些。理由是在郑氏集团那儿，商业经济同为之服务的军事、政治、外交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情形差不多。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像西方那样，有一套与物质生活领域相适应的精神价值体系，从而形成现代化社会所必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良性循环。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了郑氏海商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向传统社会强有力的挑战，即经济上体现于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向封建性质的计划经济的挑战；政治上是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向农业本位的政治实体的挑战，尽管政体形式仍取传统样式；意识形态上是商业价值体系向儒家伦理体系的挑战；社会整合方向上是市场原则向指令性原则的挑战；社会形态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向古老的“军事——农业复合体”的挑战；军事上是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向农耕社会的陆军的挑战。

顾准曾极有见地地指出：资本主义若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也不能发生。他是那个时代发现资本主义与军事力量存在必然关系唯一的人。以顾准的观点来看，郑成功为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往往同军事相结合的现象，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理解中国的现

代化过程的发生,有着不容替代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9]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 and 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过去史学界一向当作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丝织业。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并在社会管理操作时做得非常成功。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江南丝织业在封建社会的指令性原则控制下,同封建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形成有效互动,因而构成农业社会商品经济的有机部分,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另外,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伦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者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远比江南丝织业社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

六、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局限性

西欧在近代以商业革命推动社会变迁,诞生新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引发了工业革命、政治革命、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塑造了新型的国际关系格局。这些运动和力量共同作用,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

而这一切在郑氏海商控制的东南区域却未发生。郑氏集团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念,这一点在郑成功本人身上就有明显的体现。他力主的“反清复明”主张现在看来仍是一种尊重传统的行为,而“反清复明”本身更是郑氏集团陷于战争不能自拔,无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因其战争所需的巨大花费而使海上商业税负过重,难以进行更大的资本积累。战争又常常干扰海商的正常贸易活动。政治领域,郑氏集团也未超脱出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框架的约束,采取传统的政体形式,这一是继承了传统,二是战争的需要;另外,台湾的经济环境也约束了它的社会经济变迁。由于当时台湾经济仍然落后,可贸易的货物有限,政治隔绝使贩运大陆货物又遭限制,因而郑氏台湾的商业缺乏一个坚实的经济后盾。它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迅速发展的工业给予支撑,从而更显得脆弱。

这一点,郑氏台湾与同时代的西班牙有相似之处。

同时代的西班牙作为最早最大的殖民帝国,积聚了大量财富,垄断了许多国际贸易。但在欧洲的争霸使它精疲力竭。而即使在西班牙鼎盛之时,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拥有财富的贵族却轻视经营工商业,更多的去购买地产,加上流入的金银过多,反使物价上涨,给发展工业造成障碍,最终使西班牙因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动力和后盾而衰落。因此,虽然我们说郑氏海商集团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上已具备了一定的近代因素,却同样由于这些方面各种不利因素之“合力”作用,而难以形成历史性的突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股颇具生命力的新生力量在强大的大陆保守力量的对抗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幕令人遗憾的历史剧。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了一个真理:参与广泛的交流才可以有更快的进步。但我们却失望地看到宋元以来积极参与全球交流的东南海商力量,被封闭锁国的保守力量无情地压倒了,郑氏集团的发展史构成了这一近代化潮流与传统力量较量历程的缩影。

再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宏观上可以看作是两种循环。经济、军事、政治、法律构成社会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循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构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循环。前者属于“形而下”,后者属“形而上”,两者在社会更大的范围构成循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基本相适应。比照之下,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会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在“形而下”的社会制度领域,尽管商品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已形成相关循环,但细加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一环,其金融体制并不发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一环,其法律制度仍无迹可循,其政治体制的形式仍沿袭着传统王权组合方式。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更属于封建传统的儒家范畴。这是由于“重农轻商”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意识中向来蔑视商业价值观念,知识分子深受儒家熏陶,根本不屑从理论上论证商业社会产生的契约原则的合理性,因而不象西方的卢梭那样站出来论证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商业社会的合理性。即使人们在具体生活中按商业价值行事,但远远不能成为社会主导。至于同政治经济制度运作层面相适应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更无从谈起,而韦伯所认为必需的新教伦理更是无影无踪。所以,虽然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最能代表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因其被强大的传统社会所扭曲,其发育仍是一种畸形状态。

七、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结束语)

从东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军事上,郑氏海上武装力量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商业文明性质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这支旨在维护海上贸易海军的出现说明,中国本土也能或迟或早地自发地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意识¹。在经济上,它不同于农业社会商业经济,而具有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它代表着市场原则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新的社会力量。而郑氏集团的覆灭则表明:以封闭型大河流域灌溉型农耕生活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具有异常强大之生命力,它对不管是内部自发产生的

还是外部输入的异质文明具有极大的抵触力。郑氏集团的毁灭也许使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丧失一次自我更新的机会。

(本文系泉州市郑成功学术研究会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中心合作研究课题,课题指导:黄夏莹 成员:侯小莹、王伟明、倪乐雄 执笔人:倪乐雄。本课题获泉州市社科联 2000 年度重点课题奖)

I 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 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版,第 219 页。

II 马克思·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 1987 年 12 月版,第 14 页。

III 陈方正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生物演化一样,不仅仅是某个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统的发展,而是整个系统发育过程。见麦尼尔著《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过程》第 3 页。

IV 这方面的代表著是许涤新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详见其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 5 页。

V 见麦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现代等待化历程》第二章:中国称雄的时代。

VI 见《竞逐富强》第三章:“欧洲战争业务”市场夺取控制一节。

VII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20 页。

VIII 杨彦杰《一六五〇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见《郑成功研究论文选 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IX 恩格斯,《反杜林论 暴力论(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07 页。

X 以郑氏集团为典型的东南海商集团的出现,以及有别于内地生活方式的海洋社会的萌芽,可以看作地中海商业文明在本土的出现。

郑成功驱荷复合与历史反思

(美)汤锦台

(一)

与鼎盛时期二十万人的兵力相比,郑成功进攻台湾的两万兵力是稍嫌薄弱的。因为一来他们是从海上进攻,二来面对的是洋枪洋炮和比较先进的西洋炮舰,加上全军携带的粮食不足,要打赢这场东方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对西洋人的两栖作战,除了依靠作战方法和将士的用命外,是要有相当的运气的。

但是,幸赖巴达维亚方面对郑成功发动进攻的估计不足和对揆一长官支持力度的不足,加上大员本地荷人防范的失误,因此在郑军在进攻初期比较顺利地登陆成功,为日后彻底打败荷人奠定了基础。

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郑成功的主力舰(郑成功部将杨英称之为“大船”)抵达鹿耳门水道前,投降郑军的满人提督亲军骁旗镇马信担任前导,站在平底帆船的船头,郑成功座船在第八或第九条,安坐在丝织的遮阳伞下,船桅挂着白旗。

鹿耳门是隔着约一里长的北线尾沙洲与热兰遮城遥望的水道,宽约二十艘船只并排距离,由此通过,可避开热兰遮城的大炮火力。这里平时水浅,根本不可能通行大船,因此荷兰人并不在此设防。可是,据杨英的说法,这天郑成功的水师来到的时候,突然似有天助,水涨数尺。于是郑成功的船队鱼贯而过,进入了台江水域,直接从热兰遮城的东侧,对这个荷兰人的堡垒形成了威胁。当天晚上,所有的船只都进入了台江,停泊在台湾本岛的不寮港。住在本岛这边的中国人见郑成功大军来到,有几千人高高兴兴地前来迎接,并推出车子和其他工具帮助郑氏大军登陆。考虑到当时全岛汉人人数也不过两万多人,可说住在赤崁一带的中国人几乎倾巢而出迎接大军了。

这一天,驻守在热兰遮城的代司令官是描难实叮(Valentijn),他远远一见中国大军到来,立即携带两桶牛肉和猪肉及一些大米,赶回本岛的普罗岷西亚堡去,着手准备防守,赤崁市区的所有中国人都被下令留在住所内,禾寮人则被通知带家属撤到热兰遮城内。

当天半夜两点,描难实叮率员冲出普罗岷西亚堡,攻击郑成功的营盘,并焚烧荷兰人的马廐谷仓,郑成功怕粮米被焚,特遣差官杨英率官兵到赤崁街市各条街上看守放粮米的草厝,第二天又叫杨英将街上的粮米全部分发给各镇官兵,计算一下,可供半月食用。

同一天晚上,郑成功也很快完成了对普罗岷西亚城的包围,荷兰人从热兰遮城派出了六十人边战边跑,抢进了普罗岷西亚城内。

第二天,即五月一日,郑成功给揆一和描难实叮分别写信,要他们交出城堡。他在信中说:“澎湖离开泉州不远,应该由他管辖,而台湾接近澎湖,也应置于中国统治之下。我

父亲一言将此地借给荷兰人,我现在为改善此地而来,你们不应该再占有我地。”

郑军登陆本岛后第二天,宣毅前镇陈泽率兵由北线尾西北端登陆和扎营,揆一急派佩德尔船长率兵二五〇名乘领航船和数艘舢舨向该处进军,佩德尔在上午十一点率兵离城登陆北线尾南端,整顿行列和祷告后十二人为一排向郑军开枪进攻。三艘郑成功船只见状,从台江内海驶出鹿耳门,绕到北线尾西面增援郑军。揆一在城头望见,担心佩德尔处境不利,要他撤回,但是佩德尔不退。这时郑成功部队利用沙丘装好了几门小型炮,然后向佩德尔进攻。荷军赶快退却,佩德尔拼命阻止,最后在郑军的猛烈冲锋下,被一刀刺死。另有一八〇名荷军被歼,余下的跳海逃跑,被领航船载回大员。这一仗是郑军首战大胜。而热兰遮城方面原只有守军一千多人,经此一役,人数骤减至八七〇人,炮手三十五人,元气大伤。

在海上,荷兰人同样遭到很大打击。五月二日,揆一下令范德兰留下的两艘战舰、一艘小帆船和一艘快艇“玛丽亚号”对停在外海的六十艘郑成功船只发动进攻。郑氏海军的勇猛大出荷人意料。在战斗中,“赫克特号”战舰炸药爆炸,与靠近它的中国船只同归于尽。快船“玛丽亚号”逃回马达维亚。同时郑成功令宣毅前镇侍卫镇陈广和左虎左协陈冲等率水师,进攻台江海域的荷舰,击沉了一艘、焚烧了一艘、一艘走脱,以后所有荷舰转而贴近热兰遮城停泊。

在本岛,郑成功加紧了对普罗岷西亚城的包围。郑氏军队不仅拥有大批重炮,而且有一支铁甲兵。其弓箭手使用弓箭的娴熟程度也使荷兰步枪手黯然失色。另外有藤牌军,每十人有队长一人督促士兵躲在藤牌之后冲锋。还有两队黑人兵,这些人原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荷兰士兵开枪射击的本领,他们给荷兰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五月三日,描难实叮弟弟夫妇外出为郑军捕获后获释,郑成功并透过他们向描难实叮表达对荷兰人的德意。同日荷兰评议会以描难实叮孤城援绝,派出一名谈判委员和一名检察官率同七名人员,前往赤崁郑成功驻地进行谈判。郑成功坐在中军帐内,态度高傲强硬地告诉来使说,我是向公司索回原属泉州、现应归我领有的福尔摩沙土地和城堡而来,你们必须立即交出普罗岷西亚,否则将当着你们的面由精锐部队攻下这个城。他说,你们的大船被我水师烧毁,佩德尔船长和他的士兵死于我军刀下,现海陆均被占领,荷兰人绝对无法与他对抗生存下去。

荷兰谈判人员向郑成功反驳说,福尔摩沙不属于中国而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因为公司曾经向中国高级官员订立一个正式契约,规定荷兰人离开澎湖,占有福尔摩沙,所以国姓爷既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可以提出什么领土要求。至此双方谈不下去,荷兰谈判人员离开郑成功军营,并前往普罗岷西亚城实际看望荷兰守军,发现情形绝望,守军弹药不足,实在难以支撑。

谈判委员当晚回到热兰遮城,经荷兰长官揆一和评议会商议,同意交出普罗岷西亚城。第二天中午,热兰遮城看到普罗岷西亚城降下了东印度公司的旗帜,代之而起的是一面白旗,到了下午五时有代表郑氏的旗帜升到白旗下方。五月六日,普罗岷西亚城的二三〇名荷兰士兵撤出了城堡,与描难实叮等人移到了赤崁街市,被软禁了起来。就在普罗岷